

汉语与文化交际

杨德峰 编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 京

前 言

语言与文化的关系非常密切，有人认为语言是文化的符号，是文化的载体，就好比镜子或影集，不同民族的语言反映和记录了不同民族特定的文化风貌；不同民族的特定文化，对不同民族的语言的发展，在某种程度、某个侧面、某个层次上起着制约的作用，可以说语言与文化是水乳交融，没有语言就谈不到文化。

正因为如此，所以在交际中，有时候虽然听者能够“听懂”对方所说的话，但是却未必真正理解对方说的话的真实含义。例如：

A：他说什么时候把钱还给你了吗？

B：说了，他说一个月以后就把钱还给我。

A：你别听他的，他说的比唱的还好听！

A：你最近怎么样？

B：简直把我忙死了。

A：看来你是个大忙人喽！

B：瞎忙，没忙什么。

例 的“他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很容易让学生理解成“他说的话好听，唱的歌不好听”，实际上完全不是这么回事。这是一个比喻，意思是他能说会道，不能相信他的话。例 中的A说B是“大忙人”，但B却说“瞎忙，没忙什么”，这岂不是与A前面说的“忙死了”自相矛盾？其实一点也不矛盾，这只不过是一种谦虚罢了。这类表达方式都是外国人感到困惑的地方。从字面上来看，以上句子都没有什么难的词语，中高级水平的留学生都学过，但他们却未必了解这些句子的真正含义，原因就在于以上句子都包含着文化因素。

不但交际中存在这样的文化障碍，阅读的时候，也同样存在着这种文化障碍，例如：

我那口子（那位）还在外边呢！

上例的“那口子”和“那位”词典上查不到，从字面上看也琢磨不透，“那口子”“那位”是书包，还是自行车？是朋友还是同学？其实它们专指配偶中的另一方，即妻子或丈夫。用“那口子”或“那位”指代“妻子”或“丈夫”，透着夫妻之间的亲昵和随便，同时也说明在家庭中丈夫与妻子地位的平等。

类似的情形还有很多。有一部中国的小说，其中有这么一段话：

敌机过后，村子变成了一片废墟，人都炸死了，只剩下狗儿和狗儿的妈。

据说苏联的一位汉学家在翻译这段文字时，把“只剩下狗儿和狗儿的妈”翻译成了“只剩下一条小狗和小狗的妈妈”，结果闹了个大笑话。

写作是反映一个学生语言能力的手段之一，看起来好像与文化没有很大的关系，实际不然。据有人调查，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写出的作文80%不通，主要是前后不粘连。据我们考察，学习汉语的留学生同样也有类似的问题。他们写出来的东西，每一个单句没什么问题，但连起来看，就觉得不顺或别扭。显然他们的写作程序或思考方法与中国人有所不同，换句话说，他们学习汉语时，只注意了语法、词汇的学习，而忽略了中国人思考问题的途径，因此写作时常常用本民族的思考习惯来套用汉语。

由此可以看出，要想学好汉语，只学习它的语音、词汇、语法是远远不够的，也是学不好的。在学习汉语的同时，必须学习与汉语密切相关的汉文化。《礼记·曲礼上》说：“入境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就是说，到了一个新地方，要打听、了解那里行为风俗等等。“礼”是古代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它

包括社会道德行为规范的方方面面，在今天社会中也十分重要，可以说是无处不在。只有了解了使用汉语的社会的种种规范，才能把汉语学到家。

《汉语与文化交际》这本书，就是出于以上认识，专门为学习汉语的外国人编写的。本书从外国学习者的需要出发，除了介绍一些与汉语交际密切相关的文化，像忌讳与委婉、中国人的隐私、地位崇拜与焦虑、自己人和外人、语言表达的得体性等等以外，还探讨了一些汉语中所反映出的文化现象，目的就是希望引起外国学习者学习汉语的兴趣，提高他们的交际能力和说话的得体性，使他们不但说得对，而且知道怎么说、说什么，进而提高交际的成功率。

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给外国学习者讲授哪些文化，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尽管本书介绍的主要是一些与交际相关的文化，但是由于到底哪些文化与语言交际密切相关，至今没有现成的资料可供参考，因此在写作的过程中，仍然是困难重重。正因为如此，本书从初稿到定稿，前后历时数载。为了使本书能够比较全面地反映汉语交际中的文化现象，也为了更好地满足学习者的需要，解决学习者在与中国人交际时可能出现的问题，初稿完成后，前后试讲了三个学期。每次试讲之后，还对留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然后根据学生的反映和要求，进行调整增补。尽管如此，由于笔者能力有限，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恳切希望读者提出宝贵的意见。

本书在写作的过程中，吸收了前人和时人的许多见解和意见，在此深表感谢。本书的出版，得到了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的资助，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姜明宝教授，北京大学海外教育学院汉语中心的郭振华教授，北京大学出版社语言编辑室的郭力主任、胡双宝编审等都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和鼓励。特别是本书的责任编辑齐语红老师，在本书修改的过程中，提

出了许多具体而又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并为本书的出版做了大量的工作，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忱。

作 者

1999年1月于北京大学

目 录

前 言	1
第 一 节 姓氏人名	1
第 二 节 忌讳与委婉	7
第 三 节 身份制的效应	16
第 四 节 地位崇拜和地位焦虑	20
第 五 节 人情和面子	25
第 六 节 尊老与忌老	29
第 七 节 汉语中的男女不平等	34
第 八 节 汉语中的家族观	39
第 九 节 中国人有没有隐私?	45
第 十 节 汉语中的“中庸”思想	51
第 十 一 节 奇妙的数字	56
第 十 二 节 中国人心目中的五颜六色	62
第 十 三 节 倒霉的狗及其他	69
第 十 四 节 民俗与汉语	76
第 十 五 节 饮食与汉语	83
第 十 六 节 汉语中的地名文化	90
第 十 七 节 汉语中与政治有关的词语及表达习惯	96
第 十 八 节 思维、语言和民族	100
第 十 九 节 汉语的特点	107
第 二 十 节 汉语词语的色彩	115
第 二 十 一 节 成语和俗语	121
第 二 十 二 节 影响话语的地区和社会因素	127

第二十三节	汉语中的文化词语	133
第二十四节	修辞学习与汉语学习	139
第二十五节	汉语的修辞方式	146
第二十六节	修辞的民族差异	152
第二十七节	汉语的语体	159
第二十八节	汉字与文化	167
第二十九节	生活礼节	173
第三十节	中国人的自谦	179
第三十一节	“自己人”和“外人”	184
第三十二节	称呼	188
第三十三节	语言表达的得体性	195
第三十四节	打招呼 and 道别	202
第三十五节	体态语	209
主要参考文献	214

第一节 姓氏人名

一

古代的姓氏和名号比较复杂。战国以前，同一个人可以有好几个称呼，到了战国时期，才慢慢地固定下来。秦汉以后，就基本上和现在一样了。

上古时期，不仅有姓，还有氏。氏和姓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姓是一种族号，氏是姓的分支。例如：姬是周人的姓，姓姬的下面又分为孟氏、季氏和孙氏等。姜是齐人的姓，姓姜的下面又分为申氏、吕氏、许氏、崔氏和马氏等等。

战国以后，人们往往以氏为姓，姓氏就逐渐合二为一了，但这里所说的“姓”，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只有贵族才有姓，奴隶是没有姓的。先秦的一些典籍中，像《庄子》《左传》里常常出现一些怪名字，《庄子》中的“庖丁”“匠石”，《左传》中的“灵辄”，实际上都是名，他们并没有姓。

到了汉代，通称为姓，姓氏完全合并了，从天子到贫民就都有姓了。

战国以前，男子只称氏，不称姓，而女子必须称姓，贵族妇女的姓比名更重要。待嫁的女子如果加以区别，则在姓上冠以孟（伯）、仲、叔、季，表示排行，如：孟姜、伯姬、仲子、叔姬等。出嫁以后，要加以区别，常常采用下列方法：

1. 在姓前加上自己国家的国名或氏，例如：

秦嬴 郑姬 晋姬 齐姜

“秦嬴”就是秦国姓嬴的女子，“郑姬”就是郑国姓姬的女子，“晋姬”就是晋国姓姬的女子，“齐姜”就是齐国姓姜的女子。

2. 嫁给别国的国君，在姓前加上配偶受封的国名，例如：

棠姜 芮姜 秦姬

“棠姜”“芮姜”“秦姬”中的“棠”“芮”“秦”分别指她们的配偶的封地。

3. 嫁给别国的卿大夫，在姓前加上配偶的氏或邑名，如：

孔姬 赵姬

“孔姬”是卫国大夫孔圉（y）的妻子，“赵姬”是晋国大臣赵衰的妻子。

4. 死后在姓前加上配偶或本人的谥号，如：

文姜 武姜

“文姜”是鲁桓公的妻子，“文”是她自己的谥号；“武姜”是郑武公的妻子，“武”是她丈夫的谥号。

古代帝王、诸侯、高官大臣死后，朝廷按照封建社会的道德标准，根据他们的生平行为给予一个称号，这就是谥号。谥号一般有固定的字，根据死者生前事迹，选用其中的某一个作为死者的谥号，以褒贬其善恶。谥号一般分为三类：

a. 带褒义的，例如：

文 武 景 惠 孝

像汉代的文帝和景帝，实行休养生息政策，重农轻武，使当时的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了繁荣的景象，历史上称为“文景之治”，所以谥号为“文”“景”。

b. 带贬义的，例如：

灵 幽 厉 炀

像周幽王为博得爱妃褒姒（本性不好笑）一笑，而多次举烽火戏诸侯，而招致灭国，所以谥为“幽”。隋炀帝杨广，是个有名的暴君，历史上关于他的暴行的记载很多，他曾做“炮（páo）烙之刑”，即让犯人在烧红的铁板上行走。正因为如此，谥为“炀”。

c. 表示同情的，例如：

哀 怀 愍 悼

像战国末期楚国国王熊槐不听屈原等的建议，而听信谗言，最后招致灭国，所以谥为“怀”。

上古谥号一般用一个字，但也有用两个字的，例如：

齐桓公 晋文公 秦穆公 周威烈王 赵孝成王

后世的谥号除皇帝外，一般用两个字，例如：

忠武侯（诸葛亮） 武穆王（岳飞） 昭明太子（萧统）

古人有名有字，据说上古婴儿出生三个月之后由父命名，男子二十岁成人举行冠礼（结发加冠）时取字。女子十五岁许嫁举行笄（jī）礼（结发加笄）时取字。名和字往往有意义上的联系，例如，屈原，名平，字原，“平”和“原”字义相关；冉耕，字伯牛，耕地是要用牛的；宰予，字子我，古汉语中“予”和“我”为同义词。

周代贵族男子字的前面常常加“伯、仲、叔、季”，表示排行，字的后面有时加“父”或“甫”表示性别，例如：

伯禽父 伯山甫 仲尼父

春秋时男子取字最普通的方式之一是加“子”字，子是男子的尊称，例如：

子产 子渊（颜回） 子有（冉求） 子牛（司马耕）

除名和字以外，古人还有别号（别字）。别号可以是三个字或三个以上的字。例如：陶潜，号五柳先生；李白，号青莲居士；白居易，号香山居士。但常见的别号一般为两个字，例如，陆游，别号放翁；王安石，号半山；苏轼，号东坡。

二

现代人有乳名（小名）、学名（大名），有的还有笔名、艺名等。给自己或后辈取一个字雅音美、含义丰富的名字，是一般人的普通心理，汉民族的人名系统大都如此。当今的年轻父母为孩子取名也十分注意，常选择那些表示文雅、善良、温柔、美好的字眼用于女

孩子之名；选择那些表示强壮、勇猛、有为的字眼为男孩子取名。由于汉语单音节语素和语义组合的灵活性等特点，姓名用字常被合起来表示某种美好的含义，如万里、康庄、天翼等等。

人名系统中还有一种特殊的现象，即给孩子取一个难听、令人憎恶的名字，据说这么做可以保佑他的性命，恶魔就不会抢走，这就是所谓的“贱名易养”。这种“贱名易养”的心理，至少在汉代就已形成，如司马相如，小字犬子；范晔，小字砖。现代农村，这种现象更多一些，还有不少像“狗儿”“狗蛋”“狗屎”“狗剩”“黑蛋”“二狗子”“秃子”等等名字，这样的名字常常出现在文学作品里，例如：

一起晌，大人们就都到场里做营生去了，大狗和小狗像贼似的怕弄出响动，把一只铁桶抬在肩膀上。小狗在前，大狗在后，为了不发出吱吱扭扭的声音，大狗把桶死死地把住，不让它在棍上左右晃。
(黄乃谦《灌黄鼠》)

上文中的“大狗”和“小狗”并不真是狗，而是两个小孩的名字。如果不了解这种习惯，就很容易造成误会。

不过，随着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卫生保健的普及，这种乳名，在农村里渐渐地少了起来，城市里则基本上没有了。

社会的发展会带来社会心理的相应改变，特别是在急风暴雨般的社会大震荡、大转折时期，这种变化也同样影响到人名。1983年6月5日的《讽刺与幽默》上曾载过一篇短文，列出各年代出生的一串人名，转录如下：

1948年以前	贾德宝	孙发财	姚有禄	庞天佑
1949-1950	郑解放	叶南下	秦建国	向天明
1951-1953	司马图	邓援朝	朱抗美	靳停战
1954-1957	刘建设	申互助	童和平	叶志方
1958-1959	孟跃进	潘胜天	戴红花	王铁汉
1960-1963	伍坚强	冯抗洪	齐移山	赵向党
1964-1965	高学锋	钱志农	艾学雷	方家进

1966 - 1976 董文革 张要武 刘永红 邢卫兵

1976 - 1983 韩振华 李跃华 宋永富 赵文明

不难看出，每一个时期的人名都有一些特点。1948年以前，中国还处于平常所说的“旧社会”，又处于非常动荡时期，战争频仍，民不聊生，所以人们企盼“平安”“德宝”（谐音“得宝”）“发财”，也希望老天能保佑自己，免遭战争之祸，以保全性命。

1949-1950年是全国刚刚解放，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期，所以人名中也体现了人们的喜悦之情，人们用“解放”“建国”等作为名字，以示纪念。

1951-1953年是著名的“抗美援朝”时期，所以人名中出现了诸如“援朝”“抗美援朝”等字样，也出现了“停战”这样的名字，表明人们对这场战争的态度，也表明了人们希望和平的愿望。

1954-1957年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期，中国农村成立了互助组、合作社等，人名中也体现了这一特点。

1958-1959年在中国的大地上刮起了“共产风”，也就是著名的“大跃进”。这一时期，人们恨不得在几年的时间内实现共产主义，生产上出现了“比、学、赶、帮、超”的劳动竞赛，所以名字中也体现了这一点。

1960-1963年中国出现了三年自然灾害，粮食大量减产，有些地方甚至颗粒无收，1963年华北地区发生特大洪水，名字中出现了很多反映中国人的大无畏精神的字眼。

1964-1965年是雷锋大放光芒的时候，全国上下出现了学习雷锋的高潮，雷锋成了人们心目中的英雄和偶像，所以出现了不少崇拜者，这一点，从名字中就可以看出来。

1966-1976年是闻名世界的“文化大革命”时期，这一时期“革命”“红卫兵”“不爱红妆爱武装”等词语充斥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名字中当然也不例外。

1976-1983年是“十年浩劫”结束，中国重新走上正轨的时

期。这一时期经济建设是中国的主要任务，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是广大人民群众迫切愿望，人名中也体现了这一点。

名字的变化，也反映了思想观念的变化。新中国是一个男女平等的社会，中国政府历来主张男女平等，因此妇女在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过去的没有地位，是男人的附庸，变得自强、自立起来。过去孩子都是随父姓，现在有的家庭，为了真正体现男女平等，开始以父母的姓为孩子的姓，像父亲姓孔，母亲姓刘，那么孩子就叫孔刘。还有的家庭更是走在前列，干脆以母亲的姓为孩子的姓。尽管这种情况不是太多，但它反映了人们对姓这一观念的根本性变化，“姓”不专属于父亲，也属于母亲，男女是平等的。

汉族一般为单姓，但也有复姓和双姓。复姓如司马相如、诸葛亮、欧阳修，双姓如现代人刘王立明、范徐丽泰。

第二节 忌讳与委婉

一、古代忌讳

忌讳在中国古代就已经产生了，最早可以追溯到汉代。当时的忌讳，主要指不直接称君主或尊长的名字，凡是遇到和君主、尊长的名字相同的字，用改字或缺笔的办法来避免。例如：

汉高祖名邦，“邦”改“国”。《论语·微子》“何必去父母之邦”，东汉末刻石经碑改为“何必去父母之国”。

汉文帝名恒，“恒”改为“常”，《史记》中，恒山改为常山。

隋炀帝名广，“广”改为“博”，隋曹宪在为《广雅》作注释时，就不得不把书名改为《博雅》。

唐太宗名世民，“世”改为“代”或“系”，“民”改为“人”。柳宗元的《封建论》把“三世”改为“三代”，把“生民”改为“生人”；《捕蛇者说》把“民风”改为“人风”。

除了避君讳外，还避家讳。例如：

司马迁父亲叫司马谈，司马迁《史记》中提到汉文帝的宦官赵谈时写作赵同。

汉代淮南王刘安的父亲名长，“长”改为“修”。《老子》的“长短相形”，《淮南子·齐俗训》引作“短修相形”。

苏轼的祖父名序，苏洵的文章改“序”为“引”，苏轼为人作序时又写为“叙”。

三国以后，避讳的范围不仅扩大了，而且更加严格，不但避君主和尊长名字相同的字，连音同或音近的字也要避开。隋文帝的父亲名忠，因为“忠”“中”同音，于是连“中”字也一块避了，“中”改为“内”，官名“中书”改为“内史”。唐代大诗人李贺的父亲名晋肃，

因为“晋”和“进”同音，李贺居然因此不能举进士。

避讳改字外，还有避讳缺笔，这是到唐代才开始有的。例如，唐代避太宗的讳，“世”字改为“卅”；宋代避宋真宗赵恒讳，“恒”字改为“恒”；唐以后，避孔子的讳，“丘”字改作“ ”字等等。

二、现代的忌讳

现在虽然不像古代那么苛刻，但日常生活中，对于父母和长者的名字仍然存在着避讳。比如说，在家里，孩子一般不能直呼父母、长辈的大名；在公共场所，也不能直呼父母、长辈的名字，甚至学生也不能叫老师的名字，下属不能叫上司的名字等等，否则，就会被视作不礼貌，没规矩，缺少家教等等。客观上讲，这些固然体现了一种尊敬，但是这种情况的形成，也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

中国是一个宗法制社会，族长和家长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威，可以说也是家族的“君主”。族长或家长的一言一行，不仅是典范，如同是“圣旨”，只能执行，不能违抗，否则则是不忠不孝，大逆不道。这种情况极而言之，就成了族长、家长的一切，包括名字，也都成了圣物，具有了一定的法力，说话的时候应极力避免，否则会带来不幸，这大概就是避讳的真正根源。至今在中国的有些地区，孩子如果直呼了家长或长辈的名字，家长不仅会把孩子臭骂一顿，而且总忘不了向孩子训示一番：叫家长或长辈的名字有罪。这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三、委婉语

与避讳产生的同时，也产生了委婉的说法。所谓委婉，就是不直言，用比较温和、曲折的方式，来表达所要说的个人或事物、现象等等。汉语中的委婉说法非常多，比较突出的有以下一些。

（一）有关性行为、排泄以及人体某些部位的委婉语

在中国，人们长期以来认为性，乃至与性有关的一切，都是邪恶的、下流的东西，因此，在日常交际中，是绝对忌讳这一类字眼的，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委婉的说法。如“某人与某人有性关系”说成“发生了关系”；女人怀孕，不直接说怀孕，而说成“有喜”或“有了”。例如：老舍的《骆驼祥子》中就有这样几句对话：

“祥子！”她往近凑了凑：“我有啦！”

“有了什么？”他一时蒙了。

“这个”她指了指肚子。“你打主意吧。”

虎妞与祥子发生性关系后，虎妞想借自己怀孕来要挟祥子，以达到与他结婚的目的。但是，由于虎妞与祥子没有结婚而怀孕，在当时，对于一个大姑娘来说，是再羞耻不过的事情了。虽然虎妞在那个年代属于“开放”的女性，但是仍不好意思直说，扭捏地说“有啦”来代替“怀孕了”等。

有时候，说得比“有了”更加委婉，例如《高级口语》上册 第一课《隔墙对话》中有这样一段对话：

“（韩冬）天天忙，月月忙，结婚半年了，你哪天正点下过班？家里的事你管过吗？买粮买菜，洗衣做饭，全是我的事。我都两个月了……”

“什么两个月了？……，明白了，明白了。”其中的“两个月了”实际上就是“怀孕两个月了”的委婉说法，显然前者比后者要委婉得多，甚至委婉得让别人难以猜测到它的真实的含义。

人的排泄行为固然可以用去厕所表示，但是在一些公众场所，尤其是正在吃饭的场合，用“方便一下”“出去一下”就比“去厕所”更能让人接受。关于去厕所，还有一种诙谐的说法，例如：

弟兄们，今儿中午吃猪肉包子，快到一号清清肚里的食

吧。

（老鬼《血色黄昏》）

用“一号”指代厕所是现代说法，因为不少集体住所的厕所在两头，编为最小的“1”或编为最大号。近来也有用洗手间来代指厕所的。

对于女人来说，来月经与男人的遗精同样难于启齿，让人脸红，因此，除在医院里等少数场合外，一般是绝对不用这个词的，取而代之的是“例假”“倒霉了”等一类的说法，后者显然比前者委婉、隐晦得多，因此也显得文雅一些。

“例假”是解放后出现的新词，它记录了社会生活的新变化。据陈原考证，因为解放以后，中国的工厂实行劳动保护，女性工作人员遇到月经来潮时，如需要，可以请几天假，假期内工资照发，所以称作“例假”。“我来例假了”并不是真的要放假，可以轻松轻松，实际上是“受罪”的开始。“倒霉”是一种比较新的说法，妇女之所以把来例假称作“倒霉”，大概与例假带来生理的不适和行动不便有关系。

（二）身体缺陷委婉语

身体有缺陷本来就是一件不好的事情，给残疾人带来各种不便不说，心灵上也留下了某些创伤。残疾人普遍有种自卑感。有鉴于此，在某些交际场合，倘若直言别人身体缺陷，对于中国人来说，无疑是打别人的耳刮子，揭别人的伤疤。为了避免给残疾人带来伤害和不良影响，在长期的日常生活中，也形成了一些委婉的说法。连阿Q还讳说“秃”“光”“亮”呢，更不用说别人了。说“秃”难听，人们改说“谢顶”。“胖”在过去人们普遍贫穷的年代，并不见得是坏事，能够胖起来，就是“福分”，是幸福的事，说明自己的生活好，别人粗茶淡饭，自己是大鱼大肉，何等的优越！但是现在则不同了，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的生活水平大大地提高了，“胖”不再是